



7版 解放军报

## 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 特刊

2025年11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袁丽萍 李汝海

随感

## 高级将领的光辉榜样

■ 孟俭红

## 为将之道

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能干心细，投身华北抗战后，不仅积极协助朱德、彭德怀反击日顽进攻，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也在司令部建设、参谋队伍建设以及严备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反对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反对粗枝大叶，注重实地调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被朱德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八路军挺进华北后，随着我军队伍迅速壮大、作战地域不断扩大和作战对象多样化，建立机构健全、设置合理、分工较细的司令部门尤为迫切。左权从我军实际和需要出发，起草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他要求参谋人员要多去实地观察，成为“活地图”，要熟知地名地形地貌，掌握敌情，我军基本情况，做到了如指掌、心细如发，在首长询问时有问必答、答必无误。

1941年冬，左权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务会上讲话，指出要健全司令部工作制度，改善工作方式与方法，要“进行切实的深入的检查工作，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粗枝大叶，一般化的现象，必须放弃，代之以了解具体情况，切实研究情况，反对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没过多久，他又在八路军总部直属队连以上干部精兵简政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在工作作风上，必须彻底克服粗枝大叶、铺张、形式主义与文牍主义的现象，取缔多开会、滥印文件，随便宴请等现象，提倡切实朴素、节俭的工作作风”。

他还在《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

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应从敌后抗战的实际出发，不能不兼顾到及时供给战争的需要，不能不反对专门进行制式教练以及放松实战需要的教育……我们选择教育科目的标准，首先是着眼于战术实际的需要，并且根据实战的需要性再加选择。”

左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带头做的。构筑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事最能体现左权注重调研、务实备战的作风。

当时，为满足我军武器弹药需求，左权四处勘察，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由较为平坦的榆社县韩庄村迁到隐蔽的太行山黄崖洞，扩建为大型兵工厂，极大改变了我军装备匮乏的现状。

为防止兵工厂遭敌侵犯破坏，左权设计了兵工厂防御工事整体构筑方案。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但左权工作热情一点不减，把黄崖洞上上下下、沟沟岭岭实地勘察了一遍。凡需构筑工事的地方，他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并编上序号。哪里应构筑暗堡，哪里应明堡、暗堡，交通壕相结合，哪里构筑投弹所，各点火力如何配置，左权都标得一清二楚。1940年初，左权又带上八路军总部参谋人员、总部特务团军事干部、作战参谋及施工负责人到现场办公，听取大家对方案的意见。他特意跟大家强调，后期施工中发现不切合作战实际的地方，也随时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进入施工阶段，左权不仅抓进度，对工事质量也事无巨细地关注。有一次，由于施工队不懂地质，埋设电话线路时通过了风化石地段。左权检查后指出，风吹雨打日晒，不出半年石头就风化了，电话线就会暴露，还有可能被石头压断、炮弹炸断。他指导大家重新进行了埋设。1941年4月中旬，左权为确保万无一失，对黄崖洞兵工厂防御设施进行加固再

建。他多次到现场督促检查施工情况，并对重点地段进一步勘察，修正构筑方案，使其更加符合作战需要。他特别交代特务团长，要根据防区划分将部队拉来演练，工事全部完工后再来个全团大演习；各级指挥员对自己的位置、部队的防区范围、支援路线和转移路线要记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对工事编号、战斗位置也要熟记。防御工事完工后，左权要求特务团各部进行实兵演练和埋雷、投弹、射击、刺杀、防毒等训练。8月，左权又几次到场，亲自组织并观看特务团演习，解释有关战术要领和阵地防御作战思想。

当时，黄崖洞地形图既有比例五万分之一的整图，也有其他比例的分解图，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左权让特务团将地图放大到五千分之一，绘成一张整图，不仅反映守备区全貌，而且将构筑的暗堡、交通壕、投弹所、障碍物、各级观察所及指挥员位置、支援路线和防区范围等，都按统一标号标了出来。

凝聚左权心血的防御工事很快就派上了用场。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旅团共5000多人进攻黄崖洞，妄图端掉兵工厂。左权一面组织兵工厂转移人员、物资和机器，一面指挥兵力约1300人的特务团，用“咬牛筋”战法与强敌周旋，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和毒气袭击。战斗一打响，左权就伏在那张放大的地图前标注、划线，进行总体指挥。此前实地勘察时的工事编号，为其指挥作战、调兵遣将起了很大作用。经过8昼夜激战，特务团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并创造了6:1的敌我伤亡比，被中央军委认为“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特授予特务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荣誉称号。

左权还是个军事理论家，仅在华北

敌后5年间，就撰写了40余篇著作。其中，战术研究是其所有军事论著中分量最重的，为总指挥部下达命令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百团大战交通破坏战术》《战术问题》等著作，直接诠释了游击战的理论思想，是中国人民面对强敌选择游击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当事者语”。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备条令》下发八路军各部队后，总部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左权的理论建树不是在书斋里实现的，而是在抗战的炮火中完成的。巍峨的太行山是他的“书桌”，奔腾的漳河水是他的“墨水”，前线的战斗是他的“素材”。他的实践，他的思考，加上他的刻苦，成就了这些鲜活丰富的军事论著，成为我军一笔厚重的财富。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1942年5月25日，左权壮烈牺牲。7月3日，与他共事多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刊发《祭左权同志》一文。文中说，左权对“军队的一切建设，部队的管理教育，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运筹帷幄，无不精细周详，大事不忘，小事不忽”。聂荣臻评价，左权对日常工作中的负责，绝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他对司令部工作计划，对部队工作的指示，绝非说多做少的清谈家可比；他的精干朴素、实事求是是精神，更绝非虚设机构摆空架子的人可比。

战场上，搞形式主义是要掉脑袋的，要一切从战场实际的需要出发。打仗来不得半点虚假，最要重视真与实。在这方面，左权用实际行动立起了高级将领的光辉榜样。

学用脱节、不切实际，文山会海、官话套话，凌空蹈虚、不问落实，弄虚作假、蒙混过关……这些假把式、花架子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形式主义之风列为“四风”之首，持续不懈抓了十多年，很多单位出台了不少措施严查立办。但假把式、花架子并未完全杜绝，仍时不时冒头，有时表现得还更加隐蔽，危害却同样巨大。

假把式、花架子是个顽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与它作坚决斗争。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就严厉批评过它的危害。当时有人提出，“既名（红）四军，就要有军委”，硬生生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毛泽东同志认为，红四军目前只有四千多人，只是一个小部队，不必像中央之下必须设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决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他严肃地批评道：“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何用处呢……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假把式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思想与实际不相符。要纠正形式主义，力戒假把式、花把式，就要大力提倡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给那些抵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画了一幅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朱德同志在延安军事学院讲话时也说过，“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1943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校师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四个字。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不仅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也成为全党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反对形式主义，不能有懈怠情绪，要一抓到底，否则稍有大意松懈，假把式、花架子就会死灰复燃。1960年3月14日，山东省厉城县在贯彻执行省委“六级干部会师到田”指示的报告中说，县里在70天中，共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47份、表报599份。县里设立临时办公室达22个之多，近千名人员终日忙于文件表报。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情况，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认为这种状态绝非只存在于厉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

## 不要搞『假把式』

王守泉

## 档案

## 善于向群众学习

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

可以说，“善于向群众学习”既是任弼时对党的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他在早年领导共青团工作时，就号召青年“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要求共青团“深入群众”，做到“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他坚持把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贯穿到工作中，善于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47年，土改试点区——晋绥解放区出现急躁冒进现象、发生错划阶级成分问题。任弼时利用在陕北钱家河养病的机会，深入30多个村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写成《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正确进行。

任弼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群众斗争实践相结合，提出“善于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重要贡献。

(图文由中央档案馆提供)



实事求是(雕塑, 延安革命纪念馆藏)

李文摄

## 忆赤溪战斗

■ 朱绍田

河底。贺龙观察了一会儿，便向停靠在渡口边上的一条渡船走去。

看到贺龙走到身边了，渡船老板悄悄地对贺龙说：“别看我家小船五尺宽，南来北往的人可都得从我的船上过。最近，我听到了不少的消息，正想向你汇报呢。”

贺龙故作神秘地问道：“你最近听到什么消息了？”

“听说向子云这次要亲自出马，捉你这个贺胡子呢！”

贺龙听后风趣地说：“那好哇，南岔（战斗）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好东西，这次我正想请向子云的人马过赤溪到我们的县城做客呢！”

船老板一听，知道贺龙心中又有了计谋，便对自己的渡船端详了一会儿说：“听说向子云这次人马也很多，我这一条

小船咋行？”

“对头，我就是和你商量这个事情的。你看……”说着，贺龙用手向河上游一指，只见有十几只木船正排成一队慢慢向渡口划来。“我已给向子云准备了不少船，什么时候他的人马来了，这些船都归你指挥，把他的人马运过来，就把船弄到下游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贺龙就像谈家常一样，把“接敌过河”的任务部署完毕，随后就离开了赤溪渡口向县城走去……

大约中午12时，敌人已全部渡河完毕，集结后，分梯次进城。贺龙抓住敌人兵力分散、进城之敌立足未稳、后续部队支援不及的有利时机，下令围歼城内之敌。只听一声冲锋号响，霎时，伏兵四起，各个山头都把红旗打了出来，开始向城内之敌发起猛烈攻击。

在我前后夹击之下，向子云见解救城内之敌无望，便开始率领残敌沿路向赤溪渡口的河滩溃退。

敌人来到赤溪渡口时，恰逢上游刚下过一场大暴雨，河水比上午来时又涨了不少，而过河的渡船又被红军全部划走。看到前有洪水阻挡，背有红军杀来，敌人惊恐万状，拥挤在河滩上，人喊马叫，狼狈不堪。许多敌人也不管河水深浅，跳水逃命，又有不少被淹死在河水中。

战斗结束后，船老板把船队从下游带上来，领人拿着长竹竿接上铁钩子在河里捞枪支和其他物资。见到贺龙站在岸边，他高兴地大声喊道：“贺胡子，我这才知道你要我把船弄走的意思哟！”

贺龙抹着嘴上的胡子笑着回答说：“这次你可立了一大功啊！”

向子云旅被歼，不仅解除了南路之敌对桑植苏区的压力，东路和北路之敌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桑植的“清剿”。

(作者时任红四军军长贺龙的警卫员。文章摘编自《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原标题《回忆南岔、赤溪战斗》，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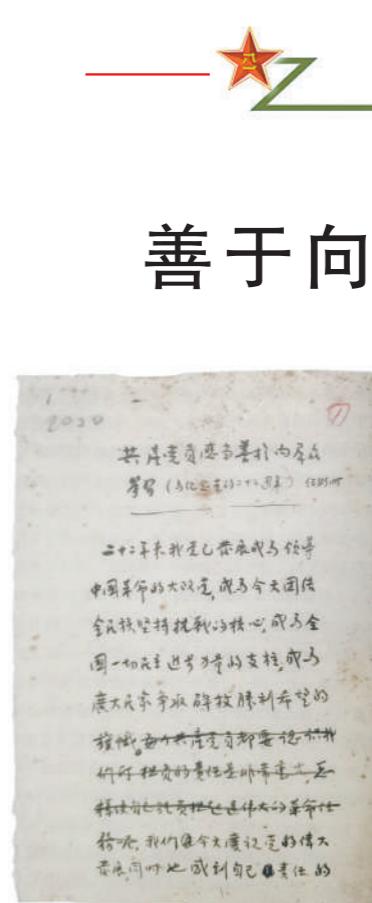


## 口述

1929年7月，为了粉碎向子云（湘西军阀）的“清剿”，贺龙同湘鄂西前委的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设“空城计”，放敌进城，然后集中兵力，将敌围歼。

7月14日中午，一场大雨过后，贺龙头戴一顶斗笠，身穿白布小褂，带着我悄悄地走出了桑植县城。这一带是贺龙的老家，一路上都是熟人。贺龙边走边打招呼，我们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离城不到3公里的赤溪渡口……

贺龙站在岸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顺手捡起一根木棒向河中抛去，想看看水的流速，可是木棒漂流不远，便被卷入了



任弼时同志于1943年6月写下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中央档案馆藏

1943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深刻阐述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明确指出向群众学习的目的在于改造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从而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文章认为，每个党员能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